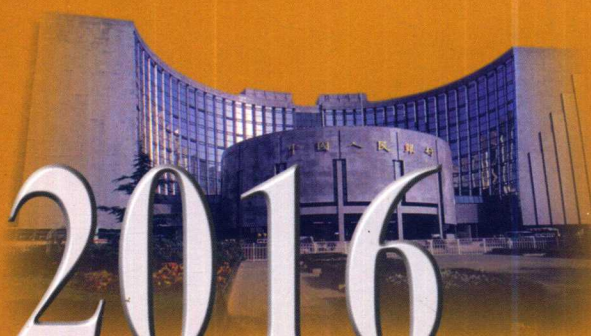




2016

中国金融发展报告

千村调查：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与使用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

中国金融发展报告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6 中国金融发展报告/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12

ISBN 978-7-5642-2655-8/F · 2655

I. ①2… II. ①上… ②上… III. ①金融业-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2016 IV. ①F8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5011 号

□ 责任编辑 石兴凤

□ 封面设计 张克瑶

2016 ZHONGGUO JINRONG FAZHAN BAOGAO

2016 中国金融发展报告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710mm×960mm 1/16 29 印张 520 千字

定价:72.00 元

2016 中国金融发展报告编委会

主 任：刘莉亚 柳永明 徐晓萍

王安兴 丁剑平

成 员：粟 芳 谈儒勇 金德环

胡乃红 曹 啸 朱小能

王明涛 马文杰 陈利平

杨金强 朱 杰 侯克强

前 言

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是以“三农”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大型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研究项目,旨在通过专业的社会调查获得我国有关“三农”问题的数据资料,形成调查研究报告和决策咨询报告,供国家相关部门决策参考。7年来,学校分别以“我国农村基本状况调查”、“我国农村医疗保障状况调查”、“我国农民收入状况调查”等为主题,组织完成了七期“千村调查”,不但积累了庞大的数据资料,而且形成了3 500多篇调查报告,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获得了多个重要奖项(包括“挑战杯”全国一等奖、上海市特等奖)。作为国内一个具有长期延续性的重要社会调查品牌,“千村调查”将每年以不同的视角为切入点,不断地传承下去。

截至2015年,“千村调查”已经走过了第八个年头,2015年度“千村调查”的主题是“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与使用”。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如何建立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以及为农民服务、使农民受益的农村金融体系,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本次活动通过对县域金融办、农村金融机构、行政村以及农户的调研,全方位地还原农村地区在存、贷、汇、保险及互联网金融等基础金融服务方面的使用情况,进而对未来农村经济金融发展走向及发展模式提出了建议,为监管部门的政策决策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本次调研由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牵头,各院系和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在2015年7~8月间,采用随机抽样定

点调查和学生返乡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各个乡镇进行了调研。其中,定点调查组是分别由来自各个院系的309名同学和来自金融学院、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人文学院的21位专业带队教师组成的30支队伍。他们走访了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市、广东省湛江市吴川市、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北流市、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市、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重庆市巫山县、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册亨县和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共30个县市。每支定点调查队伍完成县域金融办问卷1份,挑选具有一定贫富差距的2个乡镇、4个行政村和200户农户,完成乡镇金融机构问卷2份、行政村问卷4份、农户问卷200份。以每2名同学为单位组成入户调研小组,全部采用面对面访谈,一人提问、一人记录的形式完成问卷。

返乡调查组由1109名同学组成810支队伍,由城镇地区、农村地区和家庭相邻地区的学生组成1~3人的调研团队合作调研,利用返乡机会就近、就便开展调研,期间共走访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490个县域。同时,鼓励以往参加过“千村调查”的同学回到原调研村寨继续调研,鼓励部分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同学回到家乡进行调研,以保证数据的覆盖面和延续性。

2015年7月13日,首支定点调查队伍正式出发,8月25日,最后一支队伍顺利返回。经过2个月的数据录入和处理,最终共回收有效县域问卷30份、有效机构问卷60份、有效行政村问卷743份、有效农户问卷15387份,收到学生提交的各类调研报告共852篇。

本次“千村调查”是集社会实践、专业学习、科学研究、创新能力培养为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也是一种在共和国田野上进行国情教育的新型育人模式。象牙塔中的师生们在亲身实践中看到了这片辽阔土地的面貌,加深了建设祖国的热情;在实践中潜移默化

地培养了对学术的严谨性,上了一堂深刻的科研训练课。作为一次良好的体验式教育范本,有助于培养学术能力及开拓创新能力俱佳的高素质人才。

编者

2016年10月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部分 总报告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差异性调查	(3)
---------------	-------

第二部分 专题报告

我国的农村贫困状况以及扶贫的金融瞄准策略	(21)
我国农村互联网金融的现状与困境	
——基于 2015 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	(53)
需求小荷露角,供给驻足不前 政府仍需努力,市场逐渐有序	(87)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调研报告	(135)
城镇化过程不应拖累农村经济的发展	
——“千村调查”中一种现象的反思	(161)
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与金融支持	
——基于偃师市的调查研究	(173)
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户何种特质相关?	(186)

第三部分 系列随笔

尴尬的中国农村金融	(201)
农村金融状况的文化透视	(206)

第四部分 学生优秀论文

“三农”保险发展现状分析	
——关于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农村的调查报告·····	(213)
西部农村地区贷款体系的现状与改进	
——基于甘肃省古浪县的调查·····	(231)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村互联网金融使用意愿研究	
——对江西省乐平市互联网金融的调查·····	(241)
“新常态”下的农村产业转型及保险现状分析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调查报告·····	(249)
农村保险路漫漫	
——基于山东省诸城市农村保险现状的分析·····	(265)
农村互联网金融的使用情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基于安徽省桐城市的实地调查·····	(276)
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分析及建议	
——基于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市范岗村的调查·····	(290)
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与使用	
——基于衡阳市衡东县的“千村调查”·····	(306)
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与使用	
——对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的调查·····	(317)
农村互联网金融	
——以贵州省册亨县农村为例·····	(335)
襄垣县农村保险使用状况调查与分析·····	(345)
农村金融服务要“因地制宜”	
——对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市下属村落的调查·····	(354)
融资需求与投资状况对农村金融服务的影响	
——对四川省威远县农村金融服务状况的调查·····	(362)
农村“吝贷”“缺贷”谁之过?	
——第八期“千村调查”辽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调查报告·····	(371)
农村商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新农合、新农保参与率的现状分析与原因探讨	
——基于宽甸满族自治县的调查·····	(381)

“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与使用”现状不容乐观

——对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同心村、幸福村、梁山村、后岩村的实地调查
..... (396)

农村林权抵押贷款模式研究调查报告
——基于南江的案例分析..... (410)

甘肃省惠农贷款现状陈述与思考
——基于古浪县的调查报告..... (420)

农村基础商业保险服务覆盖情况分析与建议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江家村调研..... (431)

浅析南江县农村商业保险市场..... (440)



第一部分

总报告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差异性调查

谈儒勇

摘要:基于对全国 30 个县域、60 个乡镇级基层金融机构以及 15 387 户农村家庭进行的问卷调查^①,构建能反映金融普惠性的若干指标,从而度量各地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普惠金融发展参差不齐,西部地区在保险深度、不良贷款率、每百人拥有的存款账户数等指标上高于东、中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全部金融机构资产总额/GDP、保险深度、不良贷款率等指标上优于发达地区。(2)从金融的普惠性看,西部的金融机构在贷款账户数、存贷比、贷款利率、涉农贷款比重和贷款申请被拒的比例等指标上明显好于中、东部;而东部的金融机构只在存款账户数和不良贷款率两项指标上明显好于西部。(3)农村居民对传统金融服务的依赖度较高,尽管使用的便利性有待加强;农村总体对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新型金融业态以及商业保险的认可度严重低下,但这种认可随着家庭收入及学历的提高而改善;农村的私人借贷行

^① 按照一定的方法,从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单位中随机选出 30 个,作为县域调查的样本,其中,东部和中部的县域各有 11 个,而西部有 8 个,调查对象主要是当地金融办或人民银行负责人。在每个县域,按照经济发达程度,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乡(镇),以其中最大的金融机构网点作为机构调查的样本,共 60 个,调查对象是机构网点的负责人。家庭调查包括两部分:一是定点调查,60 个乡镇中,每个乡镇随机选出 2 个行政村,每个村选择 50 户家庭,共 6 000 个样本;二是大学生暑期返乡调查,这部分的样本数为 9 387 个。两者合计样本数为 15 387 户家庭,这些家庭分布在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490 个县域,受访者主要是家庭中主事的人。

为存在较严重的“不写借条”、“欠钱不还”等现象。

关键词：普惠金融 农村金融 区域差异

一、引言

普惠金融的主战场在广袤的农村。发展普惠金融，就是让原先被金融排斥的穷人和偏远地区的人们能以一种可负担的方式持续地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如存款、贷款、汇款、理财和保险等。普惠金融提倡基础金融服务的全覆盖，符合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①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十三五”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发展普惠金融，着力加强对中小微企业、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而《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也已印发。在推进普惠金融中，如何对各地的普惠金融状况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与监督关系到推进的效果。

普惠金融，也译作包容金融，是联合国在被确定为“国际小额信贷年”的2005年倡导的“在金融服务的获取上人人平等”理念。该理念反对金融排斥与金融歧视，认为只要是正当合理的金融需求，就应该有相应的金融组织通过适当的途径或渠道以合适的产品予以有效满足。从而在普惠金融下，处在贫困地区的人们或实体经济相对薄弱领域（如“三农”和中小微企业）不再被“边缘化”，在获取金融服务尤其是基础金融服务方面，与其他主体待遇相同。该理念一经提出，就获得了不少国家的响应。如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均将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确立为国家战略（吴国华，2013）。一些国际组织，如WB、IMF在建立全球各国普惠金融数据库方面也不遗余力（高亮，2014；伍旭川等，2014；肖翔等，2014；王婧等，2013），为普惠金融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支持。此外，一些专门组织业已诞生，如普惠金融联盟、普惠金融专家组和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等，为各国落实普惠金融任务提供指导（姜丽明等，2014；中国银监会合作部课题组，2014）。

为了较客观地了解各地农村普惠金融的开展情况，特别是捕捉各地及不同家庭在基础金融服务的渗透、使用、成本等方面的差异性，上海财经大学组织全校部分师生在2015年暑期走访全国农村，开展主题为“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与使用”的第八期“千村调查”。通过对30个县域、60个乡镇级基层金融机构以及15387户家庭进行侧重点各有不同的调查发现，普惠金融

^① 正如 Helms(2006, p.143)所言，普惠金融是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金融服务的唯一途径。

既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也有不容忽视的家庭差异。这说明推进普惠金融既要有统一的顶层设计,也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因地制宜地解决好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特殊群体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二、文献综述

普惠金融最早经由杜晓山(2006)、焦瑾璞(2009)等人通过著书立说渐次传播到国内,直至2013年,“发展普惠金融”被写入党的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周小川(2013)在《求是》上撰文宣扬普惠金融理念,以及同年底中国社科院等机构联合发布《2014 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报告》。一时间国内掀起了研究普惠金融的热潮。

普惠金融的反面是金融排斥。建立普惠金融的前提是了解为何一些人会被金融排斥(高亮,2014),据此可知建立普惠金融的重点所在。Sharma(2009)认为,造成金融排斥的因素主要有低收入、低储蓄、金融文盲、社会排斥、失业或就业不足、不良的理财习惯、经济剥削、缺乏认识、地理位置偏远、繁琐的程序、员工的服务态度、经济上的歧视、不能接入互联网以及复杂的金融产品等。何德旭、苗文龙(2015)从政策导向、信用评估方法、风险管理水平、金融交易机会和社会关系等方面分析金融排斥的诱因。叶兴庆(2014)认为在我国农村开展普惠金融面临成本高的难题。而王婧等(2013)、郭田勇等(2015)则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来捕捉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郭田勇等(2015)更发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对普惠金融进行科学测度,是推进普惠金融的起点。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普惠金融有三个特性(谢升峰等,2014):渗透性(金融组织与从业人员在地理与人口方面的分布情况)、可得性(获得金融服务的便利程度)和使用性(低收入阶层和小微企业对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Sarma(2008)和 Ramakrishnan(2010)正是选取此三方面的指标来度量普惠金融的。Arora(2010)则从银行服务的范围、便利性和成本三方面找出不同国家的差异性。前者没有考虑使用金融服务的便利性与成本;而后者没有考虑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Gupte等(2012)弥补了两者的缺陷,使用更加综合的指标体系来考察印度普惠金融的历年变化情况。此外,WB和IMF在相关数据库中使用的各具特色的指标为比较各国的普惠金融提供了权威的视角。在国内研究方面,伍旭川等(2014)立足于三个维度(可得性、使用情况与服务质量),选取了11个指标加以综合,并把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在“金砖五国”中,中国的普惠金融只好于印度;而在133个样本国家中,中国居第71位。王婧等

(2013)分别从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角度,选取若干指标,对整个国家的普惠金融进行测度。而石建民等(2014)从普惠金融的前提、过程与结果三方面构建指标,对山东菏泽市普惠金融进行测度。以上研究属国家层面,或针对某国局部地区。田霖(2012)和焦瑾璞等(2015)则针对中国各省份进行研究,前者从农户、企业和区域三个维度建立指标,对31个省份的农村普惠金融进行测度;后者从可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三个维度建立19个指标,对各省的普惠金融进行测度与比较。不同研究选取的指标大同小异,为本课题选取适当的指标进行区域层面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参考。

为了提高对普惠金融的认识,一些人指出了金融不普惠的危害。Chatto-padhyay(2011)研究得出,如果一国银行体系内部缺乏包容,甚至是排斥,将导致GDP损失1%。也有人指出,普惠金融比金融发展本身对经济增长更加重要(宋汉光等,2014)。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普惠金融体系过程中,要吸收别国的经验。焦瑾璞(2014)、杨伟坤等(2013)、范秀红(2014a,2014b)、姜丽明等(2014)和谢升峰等(2014)均介绍了典型国家在建设普惠金融方面的经验。比如,肯尼亚通过手机银行将服务送到缺乏物理网点的穷乡僻壤;俄罗斯通过实施“金融扫盲五年计划”(2011年7月~2016年6月),来促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取必要的金融服务;而墨西哥和秘鲁均将普惠金融工作重点放在加强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普及金融知识和推动本国金融机构的透明化上;巴西则通过代理银行模式有效地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印度尼西亚通过颁布专门法律来推动普惠金融建设,如该国的《小额信贷法》允许小额信贷机构吸收有限规模的存款,从而解决了小贷机构的资金来源问题。我们的两个邻邦——日本和韩国,作为农村普惠金融的先进国代表,通过发挥基层农民组织——农协——的作用,走合作金融之路,从而在广大农村实现了普惠金融目标。

回到国内,对于如何建设普惠金融,学者们见仁见智。潘功胜(2015)一方面指出普惠金融不能单纯依赖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强调要建立普惠金融政策保障体系。叶兴庆(2014)给出了普惠金融的四条发展路径。其中一条是扩大抵押物的范围;另一条是政府给予普惠金融机构适当的补贴,以降低其运营成本。高彦彬(2014)认为应颁布《农村普惠金融法》,明确三类新型机构的法律地位;并且要允许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一站式的基础金融服务,包括贷款、存款、汇款、结算、缴存社保金、领取补贴、保险、债券、股票及购买理财产品等。而王守淦(2014)主张在立法方面分两步走:先由国务院出台《发展普惠金融的暂行办法》,再由人大制定《普惠金融促进法》。范秀红(2014b)认为普

惠金融机构在初期不适合审慎监管,审慎监管的结果可能是“好心没办成好事”。^① 谭文培(2013)认为在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中,要处理好市场、政府与社区三者之间的关系。曹凤岐(2010)认为不仅需要发挥各类微型金融机构的作用,还要发挥其他金融组织的作用,如吸引商业银行及 PE、VC 等机构参与“三农”项目。宋汉光等(2014)则认为可在国家层面设立普惠金融发展基金。吴国华(2013)建议由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全国农村普惠金融的规划、协调与监督等工作。综合来看,这些主张要么停留在整个金融体系上,没有突出农村金融体系(毕竟农村是普惠金融的主战场);要么没有考虑到不同农村地区在金融发展的基础与环境方面存在差异性。

三、县域调查

作为千村调查的定点部分,30 个县域是从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单位中按一定的方法随机选出的。自 2013 年开始,上海财经大学固定地对这 30 个县域进行调查。在最近的调查中,由于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数据不可得,代之以预调研的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保证样本数仍是 30,从而可以对整个样本按人均 GDP 的高低进行三等份分组,依次为发达组、一般组和欠发达组。同时,我们也将 30 个县域按东、中、西进行分组,东部和中部的县域各有 11 个,而西部有 8 个。经过分组,就可以捕捉一些指标在组间的差距。

1. 在金融机构家数、金融保险业增加值/GDP、每万人中金融从业人数、每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网点数等指标上,西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而欠发达地区也明显落后于发达地区(见表 1)。具体而言,西部地区在机构入驻方面的吸引力远不如东、中部,而中部与东部的差距不大。因此,在机构布点上,今后政策导向应是鼓励更多的机构开拓西部地区的市场,西部市场的渗透率亟须提高。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经济一般组拥有的金融机构家数竟然高于发达组,可能的解释是发达地区的市场需求已被充分挖掘,竞争过于激烈,对机构的吸引力不如一般组。在金融保险业增加值/GDP、每万人中金融从业人数、每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网点数三个指标上,从东到西、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大体呈递减之势。这说明金融与经济密切相关,经济发达的地区,金融业也发达。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经济一般组拥有最多的金融机构家数,却拥有最少的机构网点数,说明在这些县域,机构进来的动力强,开设新网点的动力却不强。

^① Helms(2006,p.86)也指出,“不吸收存款的专业性小贷机构不应该接受审慎监管”。